

明初高丽使臣高邮怀古诗的文化内涵

陈彝秋

(南京晓庄学院 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71)

摘要: 明初高丽王朝奉使大明的使臣在他们的高邮怀古诗中表达了对张士诚的同情,一些使臣还借张士诚与朱元璋的对比暗寓对朱元璋的不满,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域内同时代书面文献相关主题的缺失。这些作品中,张士诚被选择为与朱元璋相对应的一个正面形象,既与特定时期下高丽与明朝紧张的外交关系有关,也取决于使臣所经历的使行路线、使臣对张士诚的心理感受等诸多因素,还有可能也受到了当时吴中士人情绪的影响。

关键词: 高丽;高邮;张士诚;朱元璋;怀古诗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5)05-0110-07

On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in Nostalgic Poetry of Gaoyou Written by Korean Envoys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CHEN Yiqiu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Xiaozhuang College, Nanjing, Jiangsu 211171, China)

Abstract: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 some of Korean envoys showed their sympathy for ZHANG Shicheng and dissatisfaction for ZHU Yuanzhang in their nostalgic poetry of Gaoyou. These poems with strong chanting means made up for the lack of related subjects of written documents in the same time. In these works, ZHANG Shicheng was chosen as a positive image corresponding to ZHU Yuanzhang, which was related to tense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Korea and the Ming Dynasty under the specific period, also depended on the route of the mission of envoys and envoys' mental feeling for ZHANG Shicheng, and could also be affected by the mood of Wuzhong literati at that time.

Key words: Korea; Gaoyou; ZHANG Shicheng; ZHU Yuanzhang; nostalgic poetry

洪武元年(1368)十二月,朱元璋遣符宝郎倪斯颁即位诏于高丽,翌年五月,高丽派礼部尚书洪尚载、监门卫上护军李夏生往南京贺登极,八月,朱元璋诏封恭愍王为高丽国王,明与高丽政权(918-1391)就此建立了朝贡关系,此后虽有反复,但高丽奉使南京的使次却始终络绎不绝。使行途中,因地理之所历,一些使臣往往留下与之相应的咏史怀古之作。江苏境内的高邮因是使臣们乘运河往返南京的必经之地,也成为使臣们着意吟咏的对象。这些高邮怀古之作多因张士诚而发,同时又寄寓着使臣各自的感慨。

一、朱元璋、张士诚比较中的微妙情感

高邮地扼江淮水陆交通要冲,城外湖河相接,城内人物繁胜,人称江北泽国,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收稿日期:2015-02-16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明代中朝使臣文学研究”(编号:2011SJD750006)

作者简介:陈彝秋(1975-),女,江苏南京人,文学博士,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

元人王恽《高邮道中》诗云“筑甬余三百,湾环护漕沟。重桥穿宝应,一岸入高邮。水陆开亭转,烽烟静塞愁。腰缠无十万,官遣上扬州。”^{[1] (p476)}对高邮地理形势的描述堪称真切。高丽使臣权近《重过高邮城》也这样写道“十里孤城广野中,六桥高似卧波虹。轻舟直截千门过,一水纵横四面通。”^{[2] (p69)}高邮城四通八达,舟车交会,得之则占尽地利,失之则处处掣肘,军事地位十分重要。元至正十三年(1453),张士诚袭据高邮,自称诚王,建大周政权,改元天祐。因高邮为张士诚所占,元政府的南北漕运受到很大影响,而张士诚又“屡招谕之不降”,^{[3] (p3346)}至正十四年(1454)九月,“元右丞相脱脱总大军出讨,数败士诚,围高邮,隳其外城。城且下,顺帝信谗,解脱兵柄,削官爵,以他将代之。士诚乘间奋击,元兵溃去,由是复振”。^{[4] (p3693)}张士诚自至正十三年起兵,至正二十七年(1367)败亡,十四年间,实以高邮一战的历史影响最为深远。

明初一些高丽使臣途经高邮时,往往会联想起刚刚过去不久的高邮之战,以及张士诚最终败亡的命运,从而引发感慨,形诸于诗。此以年代先后为序,将相关作品引录如下:

窃据金汤备击攻,精兵百万谩争雄。可怜瓮牖绳枢子,却为刘郎始立功。

——金九容《高邮州次达可韵》^{[5] (p19)} (1373)

数堞危城傍水斜,客来停棹为咨嗟。可怜胜广成何事,输与刘郎作汉家。

——郑道传《过高邮》^{[6] (p309)} (1384)

湖光潋滟绕重城,粉堞崔嵬百里明。仰认圣人忧治世,故留精卒诚严更。往时豪杰来历险,每逞顽凶此弄兵。毕竟驱民为汤武,今看菱芡满池生。

——郑梦周《高邮城》^{[7] (p572)} (1386)

四面长河百雉城,熊罴皆服我师精。鱼书狐火今安在?汉帝龙兴致太平。

——权近《过高邮州》^{[2] (p68)} (1389)

天低水国云笼树,霜落寒潮浪拍空。千古英雄无限恨,只今衰草起秋风。

——赵浚《高邮城北怀古》^{[8] (p409)} (1391)

就历史进程而言,不管是作为反抗暴政的英雄,还是得势骄纵,未能定鼎的失败者,张士诚与秦末登高一呼,天下景从的陈胜、吴广都颇为相类,因而这些使臣多喜将二者相提并论,“瓮牖绳枢”、“鱼书狐火”云云,意皆在此。而崛起于元末群雄之中,击败张士诚,建立大明王朝的朱元璋也就顺理成章地被比作汉高祖刘邦。至如朱元璋本人,在元末乱世中也接受李善长的建议,以学习刘邦成就帝业为理想。^①对这五首诗做一整体观照,可以看出在朱元璋与张士诚之间,郑梦周与权近的诗作表现出偏向明政权的情感倾向,金九容、郑道传对张士诚则心存同情,赵浚更是对张士诚的悲剧结局遗憾不已。身为奉使大明的朝天使臣,他们公然表现出对张士诚的同情,不能不说其中颇有微妙。

(一) 特定情境下紧张的明、丽关系促发了高丽使臣对张士诚的同情与怀念

金九容的《高邮州次达可韵》与郑道传的《过高邮》着意于将朱元璋与张士诚进行比较,借以表达对张士诚的同情。二诗在立意与结构上几乎如出一辙,皆是先言高邮城地形险要,接着又慨叹张士诚多年征战的努力付诸东流,最终朱元璋统一天下,建极称帝,“可怜瓮牖绳枢子,却为刘郎始立功”,“可怜胜广成何事,输与刘郎作汉家”,对张士诚表示同情的同时,也为其稍稍流露不平之意。金九容于洪武五年(1372,高丽恭愍王二十一年)充任圣节使成元揆的书状官奉使大明,《高邮州次达可韵》即作于次年自南京使还至高邮途中。洪武五年,朱元璋遣使送陈友谅之子陈理至高丽安置,因其时高丽亲元势力甚大,身为明使的孙内侍被杀,^②得悉真相的朱元璋十分震怒,为示惩罚,便对已经取道太仓,准备渡海回

^① 《明史·李善长传》记朱元璋起义未久就曾向李善长询问“‘四方战斗,何时定乎?’(李善长)对曰‘秦乱,汉高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五载成帝业。今元纲既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濠产,距沛不远。山川王气,公当受之。法其所为,天下不足定也。’太祖称善。”

^② 壬子年(1372)孙内侍之死,《高丽史》与《高丽史节要》均记载为“自缢于佛恩寺松树”。然《高丽史》卷四十四,癸丑(1373)七月壬子下还引述了朱元璋责问高丽使臣的话“有姓孙的内侍废了,说病死了,自吊死了。说的差呵。我问的明白了也,恁那国王着带刀的人每窗下门外看守,行里步里关防的紧呵。那火者说道:我是本国的人,怎的这般关防我?说呵,姓朴的宰相不容说,打了一顿,更与了毒药药死。门里不敢将出,后墙上拖出去了,特地把帽子高挂在树上,尸首吊在树下,故意怕毒药显出,等的口内生蛆,才方交百姓来报。”从这些细节可知,孙内侍确实死于毒杀。

国的金九容使团下了禁行令,长达数月不让离去,直到第二年的四月,方才又将他们召回南京,派专人伴送,沿运河北上,自山东渡海经由定辽卫回还本国。^①经历了长时间的惶恐与不知所措,惊魂稍定的使臣对朱元璋既不满又敬畏,故而经过高邮时,金九容便借怀古之机,以同情张士诚的方式含蓄地表达对朱元璋的复杂情绪,这种情绪是紧张的明、丽关系在使臣心理上的投映。郑道传《过高邮》则作于洪武十七年(1384,高丽辛禑十年),其时他正以圣节使郑梦周书状官的身份赶赴南京。当时的明、丽关系也十分紧张,据《三峰集·事实》的记载“时国家多衅,帝震怒,将兵于我,增定岁贡,杖流陪臣金庾、洪尚载等于远州,在廷之臣,惮莫肯行。”^{[6] p527}郑道传虽毅然前往南京,但对自己此行的命运实无把握,在忐忑不安的心理影响下,行经高邮时,他很自然地想起本年初刚刚被明朝流放的本国使臣金九容的不幸命运,故其《过高邮》一诗在语意上全袭金九容《高邮州次达可韵》,也就可以理解了。“客来停棹为咨嗟”,郑道传所叹息的不仅有张士诚的不幸,也有金九容的不幸,以及强硬的朱明政权下包括自身在内的高丽使臣的不幸。

赵浚的《高邮城北怀古》,对张士诚的怀念与遗憾之情表现得更为直接。赵浚的心态自然与当时的明、丽局势密切相关,此诗是他洪武二十四年(1391,高丽恭让王三年)赴南京贺圣节时所作。在此之前,高丽与明的关系因铁岭卫事件及高丽权臣私自废王事件等又趋于紧张,朱元璋对高丽表示了明确的反感,为此数次坚拒高丽来朝。基于朱元璋的强硬,使臣自然而然地想象如果是张士诚统一天下,以其宽和仁厚,必无今日为难局面。使行之初与友人相别,赵浚就明确表示“此行不是观周乐,要使吾民见太平。”(《辛未六月二十日奉使大明,道过黄州,赠尹观察》)^{[8] p409}忧思郁结。来到金陵城下,晦暗夜色中看“钟山隐隐月朦胧”,境与意会,前途吉凶未明,因而不自觉地生发出“天下莫强仁可结”(《夜泊金陵》)^{[8] p415}的慨叹,既紧张又忐忑,可见其时使臣所承受的巨大心理压力。虽然赵浚于高邮怀古时,并没有如其他高丽使臣那样将张士诚与朱元璋做直接的对比,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语境中,为张士诚而怅惘、不平实际上是要表达对朱元璋的不满,对张士诚的怀念折射的是使臣对朱明政权心理上的疏离。

(二) 政治立场与心理期盼让高丽使臣在尊重张士诚的基础上倾向朱元璋

郑梦周是高丽末叶亲明派的代表,他现存的高邮怀古诗在朱元璋与张士诚之间倾向于前者,既取决于他的政治立场,也寄寓着他对明、丽间长保安宁的希望。“湖光潋滟绕重城,粉堞崔嵬百里明”,开篇即点出此城“四隅皆低,城基特高”,^{[9] p1763}且河湖环绕的特点,本已易守难攻,可具有卓越军事眼光的“圣人”朱元璋未雨绸缪,天下安定之时依旧派重兵严守,以防不虞。“往时豪杰来依险,每逞顽凶此弄兵”,虽然言语间将张士诚的据城抗元视为犯上作乱,但也明确肯定张士诚不失为“豪杰”,因为其所作所为是出于对元末暴政的不满,所谓“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10] 《离娄》上7·9}“往昔战血流寒潮,如今菱芡满湖生”结句在无尽的喟叹中又饱含对今日清平安宁之景的欣慰。郑梦周诗写于洪武十九年(1386,高丽辛禑十二年)前往南京的路中,此次使行的任务是“请便服及陪臣朝服、便服,仍乞蠲减岁贡”。^{[11] (卷三十二)}因为高丽曾数次在北元与明之间摇摆不定,洪武十二年(1379,高丽辛禑五年)时,朱元璋为了考验高丽是否至诚事大,故意将岁贡增定为“金一百斤,银一万两,良马百匹,细布一万匹”,^{[11] (卷三十一)}因筹措吃力,高丽未能如数进贡,五年后,朱元璋又令将五年来所欠之数一并补足进上,否则兴兵问罪。郑梦周临危受命,于举国忧惧之时出使南京,冀以专对之才回转局势。因郑梦周本人是非常坚定的亲明派,诗中涉及朱元璋与张士诚时,他并未因明、丽关系紧张而对朱元璋这位明朝帝王心生怨怼,而是很自然地明确认定前者才是真正的圣人,是像商汤、周武一样的开国明君,对自己此次使行能够达成蠲减岁贡,并化解危局充满信心。

权近的《过高邮州》对朱元璋结束元末战乱,重建汉家天下的帝王功业大加赞美。此诗作于洪武二十二年(1389,高丽辛昌即位年)使明之时,此行目的是请求明朝同意让高丽幼主辛昌亲自入明朝觐,以消解明朝对高丽的不信任,缓和与明朝的紧张关系。此诗诗题下作者自注曰“前元至正甲午年间,群盗据有此城。命丞相脱脱征之。请兵于我。我送精兵以助。”脱脱进攻张士诚占据的高邮城前,曾向高

^① 这一线路,可据金九容《癸丑四月自大(太)仓召至京师,赐宴光禄寺,奉天门下面听宣俞(谕),复用前韵》、《高邮州次达可韵》、《过沂州赠施伯起判官》、《盖牟城寄大(太)仓朱秀才曾以玉烛为赠》、《途中》(“夜困飞蚊昼困虱,囁人咬马血盈盈。草深泉沸炎如火,谁识辽东六月行”)、《定辽卫送伴行王奏差仪还金陵》等诗推知。

丽征兵,高丽亦如所令,凑了两万三千人加入讨张大军。因为高丽相助元军,故就此战而言,以权近高丽人的立场,张士诚军自然被目为“群盗”。“鱼书狐火今安在”,虽然高邮之战大伤了元朝的元气,其影响有如大泽乡起义之大削秦朝气运,但一切终成历史,诗末“汉帝龙兴致太平”一句,点明朱元璋才是天命的真龙天子,是他最终结束了给民众带来深重苦难的多年战乱,开创了天下太平的治世图景。

高丽使臣过高邮而怀古,通过张士诚与朱元璋的比较传达对朱元璋的看法及微妙情绪,这种情况多发生在高丽与明政权的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当明、丽关系趋于和缓时,同样是途经高邮,怀古寄兴就为写景抒情所取代。与绝大多数域内的高邮诗相比,朝鲜使臣的高邮诗并无任何独特之处,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对张士诚给予肯定与同情的高邮怀古也许是明初高丽使臣独有的兴寄。

对最终的胜利者表示敬畏与赞美,对曾经努力过的失败者给予同情和尊重,这本是人之常情。但在这种情感基调下,将两者放在一起进行意有所指比较,其中的情味就值得细究。既然高邮怀古诗中对张士诚的同情与怀想是高丽使臣用以表达对朱元璋微妙情绪的一种方式,这就不免让我们产生一个疑问:为何选择张士诚?仅仅是使臣们地理所历的巧合,抑或有其他更为深层而复杂的原因?

二、高丽使臣同情张士诚的历史与心理背景

元末群雄纷起,除张士诚外,仅建国立号者就有大金朱光卿、天完徐寿辉、宋韩林儿、汉陈友谅、夏明玉珍等,这些人虽败亡原因各异,但无一不是事业未竟身先死,各有令人叹惋之处。在这些悲剧英雄中,高丽使臣独取张士诚,将之作为特殊情境下比照朱元璋的一个正面形象,并非随意的选择,而是直接取决于使臣们对张士诚的熟悉程度与情感认知,这与当时背景下的诸多因素有关。

(一) 高邮之战,高丽军士初识张士诚

高丽军队因协助元军征伐高邮,得以第一次真正踏足中国的土地,转战多城,这在朝鲜半岛的历史上是一件意义非凡的大事件,张士诚也因此进入高丽君臣的视野。此战的声势可称惊天动地,“脱脱以太师、中书右丞相,总制诸王各爱马、诸省各翼军马,董督总兵、领大小官将,出征高邮”,^{[3] (p916)}几乎出动举国兵力,而且还向高丽调兵。据《高丽史节要》的记载,恭愍王派出“柳濯、廉悌臣、权谦、元颢、罗英杰、印瑄、金镛、李权、康允忠、郑世云、黄裳、崔莹、崔云起、李芳实、安祐等四十余人,及西京水军三百”,^{[11] (卷二十六)}又募国内骁勇二千余人。将帅都是当时的高丽名将,士卒亦为精锐,他们与当时在大都的高丽人组成一支二万三千人的队伍,充当攻打高邮的前锋,“城将陷,鞑靼知院长老忌我国人专其功,令曰‘今日暮矣,明日乃取之。’麾军而退。其夜,贼坚壁设备。明日攻之,不克拔。会有人谮脱脱,帝流脱脱于淮安。自后南贼日盛。我军陷六合城,又移防淮安路,李权、崔源等六人战死,崔莹力战,身被数枪。”^{[11] (卷二十六)}这一记载可与域内史乘相印证,提供了脱脱被谗以“老(劳)师费财,坐视寇盗”的部分实情。脱脱遭贬,元军星散,作为先锋的高丽远征军也功败垂成,而高邮城内自分亡在旦夕的张士诚则幸运地逃过一劫。其间,张士诚军面对号称百万的元军(实际是四十万)虽几次动念欲降,但终以孤城累卵坚守数月,这支军队的顽强与勇敢必会给高丽将士留下深刻印象。

张士诚成功坚守高邮还对高丽政局产生了重要的间接影响,高丽借此良机巩固了行将欲坠的王权。据李岭先生的研究,脱脱是元顺帝第二皇后高丽人奇氏的坚强后盾,他们以皇太子爱育失黎达腊为核心,一在后宫,一在朝堂,结成声气相通相援的后党,威胁着元顺帝的皇权。而在高丽,因为奇皇后的原因,奇氏在高丽的族亲势力迅速膨胀,家族成员布列朝廷,尽为显要之官,严重影响了旧有世家大族的利益,也威胁到恭愍王在高丽的王权。除掉脱脱成为元顺帝与高丽的共识。^{[14] (p78-80,84)}其实,当手握重兵实权的脱脱在高邮城即将攻破的前夕被贬,奇后一党失去中坚力量的消息传来,恭愍王便秘密开始了尽除国内奇氏一族的策划,他所要等待的就是脱脱再也不会东山又起的准信。至正十五年(1355)十二月,“哈麻矫诏杀脱脱于云南”,^{[15] (p190)}至正十六年(1356)五月,高丽就诛尽国内奇氏全族。恭愍王之所以敢下如此斩草除根的决断,理应是得到了脱脱的死讯。脱脱下决心离京出征高邮,就此不返;高丽军卒助攻高邮,亲眼见证失去脱脱的元军不战自溃,越发看清没有脱脱的元廷将会面对怎样的困境,并就此迅速调整外交策略,以提高本国地位,谋取更多利益。而这一切发生的重要契机,就始自张士诚对高邮的控制与坚守。

(二) 降元封太尉 张士诚非“红贼”

高丽以远征高丽的方式回应了高丽远征军对自身的围攻,这加剧了高丽君臣对红巾军的敌视。高邮之战后,一部分高丽远征军依然留在中国,协同元政府镇压声势日涨的红巾军起义,如丽末手握军政大权的崔莹,不仅“伐高邮,二十七战皆胜之”,而且之后“又御贼(指红巾军)于淮安、和、泗之间,大战,斩首虏甚众”(许穆《三峰祠记》)^{[16] [p90]} 这引起红巾军的强烈反感。至正十九年(1359)、至正二十一年(1361),三路北伐红巾军的中路军为巩固辽东战局,先后在毛居敬、潘诚、关铎、沙刘二等的率领下两次攻入高丽,第一次进攻红巾军止步于平壤,第二次则势如破竹,深入高丽王都开京,恭愍王仓惶出奔安东。金九容所作《己亥年红贼》与《辛丑年红贼》各二首记录了当时的情状,其中《辛丑年红贼》二首曰“豺虎陷京国,群臣搃不知。苍黄失妻子,颠倒弃婴儿。烟焰冲云起,山河满目悲。金汤已未守,奔走欲何之。”“岂谓吾生苦,深嗟不后先。千年文物地,一日犬羊天。民庶登山上,君王走海边。谁能莫爱死,回首泪潸然。”^{[5] [p11]} 此情此境,对高丽君臣及士人而言,是无法忘怀的耻辱及悲哀,因之,他们必对红巾军充满恨意,此由其时高丽上下共持的“红贼”之称便可知一二。

张士诚虽然也起义造反,但他并非红巾军一系的出身使他得免于高丽士人的敌意。元末各割据势力多属红巾军一系,徐寿辉、韩林儿、陈友谅、明玉珍、朱元璋等皆如此,张士诚不一样,他原为“泰州白驹场亭人”,^{[4] [p3692]} 以操舟运盐为业,因不满富家及兵丁凌辱,方召集盐民起义,并无白莲教的背景。红巾军之得名因头扎红巾而致,张士诚军的主力则是泰州、兴化、高邮等地的盐民,起义时并未束扎红巾,高丽军士与之交手良久,对此必然谥知。至正十七年(1357)张士诚因形势所迫而降元,被元朝超封为太尉,在红巾军北伐之时,张士诚已经转换身份数年,正与他称之为“西寇”的红巾军朱元璋等人争夺东南地盘,征战不休。因而高丽士人自然认为张士诚与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同属一个阵营,再加上当时张士诚与高丽的关系也处于通好状态,这一切都有利于高丽士人对他渐生好感。

(三) 遣使贸易 高丽上下熟悉张士诚

自高邮移驻平江,确立自己的势力后,张士诚主动遣使通好高丽,双方使节来往不断。史称“士诚虽降,而城池府库甲兵钱谷皆自据如故”,^{[3] [p3376]} 对外交往也是如此,并不受人臣义无私交的礼制约束。据高丽史籍记载,降元的第二年(1358)七月,张士诚所遣使者实刺不花就到达了开京,“献沈香山、水精山、画木屏、玉带、铁杖、彩段”,并寄书示以修好之意。恭愍王答书曰“窃惟太尉驰英淮左,固已佩服余风,暨移镇浙右,益钦令闻。匪远伊迩,顾予寡昧,徒以祖宗之故,获保遗黎,苟安岁月。虽常欲拜问起居,自揣无状,不足烦侍御者之道达。乃蒙太尉不鄙夷小邦,且辱便蕃之惠,不胜幸至。”^{[17] (卷三十九)} 双方一拍即合,自至正十八年(1358)到至正二十五年(1365)的八年间,张士诚共遣使高丽十二次,而高丽亦于至正二十年(1360)遣金伯环、权仲和,至正二十四年(1364)遣李成林、李韧等报聘张士诚。至正二十五年十月,朱元璋派大将徐达、常遇春率二十万大军向张士诚发起总攻,张士诚忙于应对,双方的遣使往来方才渐告消歇。

张士诚与高丽前后长达八年的友好往来保证了当时高丽与江浙之间海路交通的畅通,促进了高丽与元末吴中地区贸易与文化的发展交流,双方皆受惠于此甚多。当时张士诚治下的太仓港人称六国码头,不仅全国各地的货船络绎不绝,而且日本、高丽及南洋各国的商船亦来往穿梭其间,海外贸易十分发达。《高丽史》所记张士诚治下官江浙海岛防御万户丁文彬在至正十八年七月寄给恭愍王的一段书信值得重视,书云“文彬眇处海邑,钦仰大邦久,欲一拜殿下,以觐耿光,惜乎微役所萦,不果。兹因大邦治下黄赞至此,故得闻安吉。今车书如旧,僭(倘)商贾往来,以通兴贩,亦惠民之一事也。黄赞回,令亲郁文政进拜,聊献土宜。”^{[17] (卷三十九)} 信中提到的黄赞并非官方派遣的使臣,其身份应是来往于高丽与太仓港的商人,可见张士诚遣使高丽之前,高丽与吴中地区的民间私贸已经比较活跃。张士诚主动遣使通好,获得高丽的积极响应,双方的目的主要就是“商贾往来,以通兴贩”。在张士诚与高丽这两支官方力量的保护下,江浙至高丽的海上航线变得更加安全,双方的贸易自会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除双方官派使臣、公私商旅之外,民间的往来与交流也时或有之,通过人员迁移而产生的政治文化交流也比较活跃。而这一过程中,高丽上下对张士诚也日渐情熟。

(四) 奉使大明 高丽使臣嗟伤张士诚

高丽末期,既路经苏州,又途经高邮的朝明路线直接促成了高丽使臣对张士诚的感怀与嗟叹。洪武

初年,这些使臣先是由海路在太仓卫登陆,沿长江上下进出南京;后因海路艰险便改由辽东渡海,在山东登州上岸,辗转入江苏境内,沿运河南下至南京;洪武二十年纳哈出归降以后,辽东渤海以西驿路相继畅通,便又有使臣“逾鸭绿,渡辽河,以北抵于燕。浮河而南入淮泗,历徐、兖之墟,溯江汉以达于京师”。^{[2] [p59]}太仓本就在苏州境内,高邮则是沿运河南来北往的必经之地,前者是张士诚盘踞十二年并建立吴王政权的地方,后者则是张士诚早期大周政权的治所、一战成名天下知的王兴之地。

首先是行经苏州时的怀古。洪武五年秋,郑梦周《姑苏台》诗曰“衰草斜阳欲暮秋,姑苏台上使人愁。前车未必后车戒,今古几番麋鹿游。”^{[7] [p580]}这首诗看似有所指不明的隐晦,但在了解张士诚及其与高丽的关系之后,其寄寓也就昭然若揭。所谓“前车”,说的是吴越争霸时吴王夫差骄纵亡国的旧事,而“后车”,自然是指张士诚政权占据平江路(张士诚入据后改名隆平,入明则改称苏州府)后,只知上下逸豫,终为朱元璋所灭这一并不久远的历史。势力最强时,“士诚所据,南抵绍兴,北逾徐州,达于济宁之金沟,西距汝、颍、濠、泗,东薄海,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4] [p3694]}足以动摇天下,但其人胸无远图,只知安享承平,一味荒嬉怠政,不以军务为意,以致众叛亲离,终于落得个妻妾自焚、父子自缢、国破家亡的结局。对于这位长久以来主动与高丽政权保持稳定友好往来的吴王,高丽君臣的感情是很特殊的,对他的败亡是既谴责又感伤。人事有代谢,往来成今古,繁华强盛已成往昔,无论是夫差的姑苏台,还是士诚的齐云楼,如今已是一片废墟,怀古的忧伤之情,仲秋的萧瑟之景在郑梦周的诗中融为一体。

高丽使臣现存年代最早的高邮怀古诗是金九容的《高邮州次达可韵》,达可是郑梦周的字,这说明很有可能郑梦周才是第一个将朱元璋与张士诚类比以寄兴的高丽使臣。前文已揭金九容的次韵之作是在洪武六年自南京返回高丽经过高邮途中所作,此前他曾被迫滞留太仓数月。那么,郑梦周的原唱作于何时呢?《高丽史》恭愍王癸丑(1373)七月下载曰“壬子,赞成事姜仁裕、同知密直司事金湑、成元揆、版图判书林完及洪师范书状官郑梦周等回自京师。”^{[17] (卷四十四)}如前所述,金九容是成元揆的书状官,金九容等人的贺圣节使团与郑梦周等人的贺平蜀使团,以及姜仁裕、金湑、林完等几批高丽使团是在朱元璋的安排下,一齐回到高丽的,因此,郑梦周的高邮怀古诗应是与金九容同时而作,郑唱在先,金和在后。郑诗今已佚,其诗意虽不可确知,但我们可从郑梦周一贯的亲明立场及此行的具体情形略知大概。《圃隐集·行状》载曰“皇明之肇兴也,公力请于朝,首先归明,大为高皇帝所嘉。”^{[7] [p633]}郑梦周是最早明确倾向明政权的高丽官员之一,这一立场从未因高丽国内的局势及舆论变化而有所动摇。另外,这次使行对郑梦周来说可谓刻骨铭心。使命完成后,郑梦周与正使洪师范于洪武五年“秋八月,还道大(太)仓。至海中许山,遭飓风,船败,漂抵岩岛。师范溺死,公万死乃生,割韃而食者十三日。事闻,帝具舟楫取还,厚加赐恤。”^{[7] [p632]}此事在《明太祖实录》中记之尤详“(八月)癸卯,太仓卫奏高丽使者洪师范、郑梦周等度海洋,遭飓风舟坏,师范等三十九人溺死,梦周等一百十三人漂至嘉兴界,百户丁明以舟救之,获免。上令梦周等还京师。”^{[19] [p1393-1394]}如果郑梦周的高邮怀古诗也涉及了张士诚与朱元璋的比较,结合其《姑苏台》中对张士诚感叹与微谴并存的态度看,同情张士诚或者有之,却未必会为其感到不平,相反,对朱元璋则一定会给予颂美。

自明初以来,吴中的民间话语中就一直涌动着一股怀念张士诚的暗流,这是学界既有的共识。张士诚治隆平期间,优容文士,“又好招延宾客,所赠遗舆马、居室、什器甚具。诸侨寓贫无籍者争趋之”。^{[4] [p3694]}元末的吴中地区一时之间成为乱世中的避风港,是文人依旧可以雅集饮酒、交游唱和的安宁之地,张士诚也因之在吴中士人团体中留下礼贤之名。朱元璋对这些文人骚客的诗酒流连很是瞧不上,又对吴中世家大族及士大夫曾经支持乃至辅助张士诚心存芥蒂,破吴之后,他一方面将张士诚官署旧僚、治下各地官吏及其家属、外地流寓吴地之民二十多万人或押赴南京,或赶散迁移至淮、扬、凤、滁诸郡,另一方面又特意提高吴中的税赋,“大抵苏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4] [p1896]}因此破家亡身者往往有之。政治与经济上的双重打压让吴中士人在畏惧中越发感念张士诚政权的宽仁,为其败亡而伤感不已,如“至今父老犹垂泪,花落春城泣杜鹃”(陈基《舟中看虞山有感》)^{[20] [p1896]}云云,即可略见民间的心理倾向。高启的《吴城感旧》亦曰“城苑秋风蔓草生,豪华都向此消沉。赵佗空有称尊计,刘表初无弥乱心。半夜危楼俄纵火,十年高坞漫藏金。废兴一梦谁能问?回首青山落日阴。”^{[21] [p597-598]}以刘表类比张士诚的胸无大志,固存暗讽之意,但以全诗基调论,对张吴政权的覆亡毕竟心怀感伤。然有明一代,尤其是明初的吴中士人为远祸全身计,毕竟很少在诗文中公然表示对张士诚

的同情、对朱元璋的不满,即使偶有作品也涉及高邮怀古的主题,咏张士诚事的同时也不敢忘记表达对朱元璋的夸美,冀以免祸。^①这直接造成今日域内很少有相关的书面文献可征。但倒是在域外,在明初高丽使臣的笔下,我们看到了为张士诚而生的尊重、微谴、伤感、同情、不平、怀念等诸多情感,以及与之俱来的对朱元璋的暗讽与微词。做诗是士人表达心声的重要方式,^[22]从高丽使臣的高邮怀古诗研究见明初的外交及高丽人对明政权的看法。

我们注意到,金九容现存无多的使行作品中,就有两首寄赠太仓士人的诗作。一为《赠谭友德秀才》,诗云“时序三冬月,乾坤一病身。死生元有命,荣卫暂乖真。独恨无良药,还欣近善邻。何时小差愈,吾道更相陈。”^{[5](p19)}一为《盖牟城寄大(太)仓朱秀才曾以玉灯为赠》,诗曰“辽阳回首望三吴,万里茫茫各海隅。一点玉灯如月白,书窗夜夜忆吾无?”^{[5](p20)}由诗意可知洪武五年末、洪武六年初羁留太仓的大约半年时间里,金九容与谭、朱二秀才有过看似不浅的交往,在必有的文学交流之外,他们还有可能就文行出处、治平修齐等关涉士人之“道”的深层问题交换过意见。数月后的高邮城下,当金九容将张士诚与朱元璋并提时,其情感倾向是否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谭、朱二人的影响呢?

参考文献:

- [1]王恽.秋涧集[M].顾嗣立.元诗选[Z](初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
- [2]权近.阳村集[M].韩国文集丛刊[Z](七).汉城:景仁文化社,1996.
- [3]宋濂等.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 [4]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5]金九容.惕若斋学吟集[M].韩国文集丛刊[Z](六).汉城:景仁文化社,1996.
- [6]郑道传.三峰集[M].韩国文集丛刊[Z](五).汉城:景仁文化社,1996.
- [7]郑梦周.圃隐集[M].韩国文集丛刊[Z](五).汉城:景仁文化社,1996.
- [8]赵浚.松堂集[M].韩国文集丛刊[Z](六).汉城:景仁文化社,1996.
- [9]王象之.舆地纪胜[M].北京:中华书局,1992.
- [10]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0.
- [11]金宗瑞等.高丽史节要[M].汉城:明文堂,1981.
- [12]李崇仁.陶隐集[M].韩国文集丛刊[Z](六).汉城:景仁文化社,1996.
- [13]李詹.双梅堂篋藏集[M].韩国文集丛刊[Z](六).汉城:景仁文化社,1996.
- [14]李岭.丙申之祸与元丽关系[J].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3).
- [15]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1979.
- [16]许穆.记言[M].韩国文集丛刊[Z](九十八).汉城:景仁文化社,1996.
- [17]郑麟趾等.高丽史[M].汉城:亚细亚文化社,1983.
- [18]河崙等.太祖实录[A].朝鲜王朝实录(一)[M].首尔: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1955.
- [19]胡广等.明太祖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 [20]陈基.夷白斋稿[M].顾嗣立.元诗选(初集)[Z].北京:中华书局,1987.
- [21]高启.高青丘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 [22]乔清举.士的“诗意栖居”[J].南昌大学学报,2012(3).

(责任编辑:张立荣)

^①如明初“吴中四杰”之一的张羽,继高启、杨基、徐贲等好友相继罹遭厄运后,为全身计也被迫出仕明朝。洪武十五年张羽受命往祭凤阳明祖陵,途经高邮时写下《高邮城》一诗,诗云“茫茫高邮城,下有古战场。当时鱼盐子,弄兵此跳踉。燕师扫境出,供馈走四方。长困西百里,旌甲耀八荒。譬如高山颓,一卵安能当?骄将存姑息,颠刃待其降。两机不容发,岂暇虑杀场?一朝谤书行,将陨身亦亡。嗒哉三里城,百万莫与亢。鹿走命在庖,终然属真王。空余菩萨台,落日风沙黄。”诗中认为脱脱领百万燕师亲征,取高邮本如探囊取物,但因阵前待降的策略失误,以致功亏一溃的分析是切实而理性的。晚来风起,往事苍茫,皆从荒烟落日之中来,思之令人心伤。值得注意的是,出于对脱脱高邮一战的追怀立场,诗中特意将张士诚的起义行为鄙称为“跳踉”,“鹿走命在庖”,张士诚终究中原逐鹿而未成,与当年征讨他的脱脱一样,都是令人同情的失败者,“终然属真王”一句,颂美朱元璋才是真吴王(张士诚在苏州亦自称吴王),日后建极称帝的真命天子。